

岭南大学的创建过程及建筑形态之评析*

The Analysis of the Creation of Lingnan University and Its Architecture Pattern

董 黎
Dong Li

摘要 近代西方教会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首先在教会大学中倡导了中西合璧新式样建筑,拉开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的序幕,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现代建筑风格。该文探讨了岭南大学创建时的社会文化背景,追溯了岭南大学的创建过程,归纳其校园规划特点,评析了岭南大学建筑的艺术特征,并对建筑形态的成因进行了合理的推论,进而指出了这一案例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积极作用和社会文化影响。

关键词 岭南大学 教会建筑 中西合璧 校园规划 复兴

ABSTARCT In modern historical environment, modern western church first advocated a new architecture style which combined both western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church university, which started the renaissa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It gradually developed to be a modern architectural style with special significan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the building proces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lanning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Lingnan University, and then draws a reasonable inference on the causes of the architectural form. It in turn points out the positive effect and social and cultural influence this case had on the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KEY WORDS Lingnan University, church architecture, a combin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haracteristics, campus planning, rejuvenation

中图分类号 TU-89; TU09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232(2008)03-0034-06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中西文化交流问题研究——以中国教会建筑为例》(批准号:06BZS03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1. 办学背景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中国教会大学的初创期,在此期间能够筹措到开办经费的学校都纷纷修建了校舍。在中国建立的大学应该采用何种建筑形式?对此,传教士也是既充满自信又一片茫然。有的传教士按照自己的愿望和理解构想了一个朦胧的中国梦。为了实现这个梦,他们寄期望于西方的建筑师。对于西方建筑师来说,这是一次各显神通的时机,一次富有东方情调的尝试,一个多元并存的过渡阶段,一个法无定式的探索年代。其结果是除了都具有中国式大屋顶的特征之外,其余部分就很难有共通之处。既使是大屋顶,西方建筑师在处理手法上也有很大的差异,大致可以分成两种基本倾向。一种是以地方特色为其参考摹本,譬如:岭南大学、圣约翰大学以及华西协和大学等。另一种是以中国宫殿式建筑为其参考摹本,金陵大学开其先例。但不管何种倾向,在教会大学初创期,均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偏重,也远远没有到形成程式化的程度。

以岭南大学的早期建筑为例;岭南大学创建初期只有两座简陋的中式板屋而已。从对岭南大学早期建筑的观察中,可以发现朴实经济、功能实用、装饰简洁的设计特点,也很难以中国的或西方的某种确定的建筑风格来考察其形式渊源,倒是在普遍运用钢筋混凝土技术的同时,灵活运用岭南民居建筑的屋顶组合方式,追求传统砖砌手工艺操作的表现

作者简介 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教授(广州,510006)

方法, 可视为岭南大学的建筑特色之一。

在教会大学学校中, 岭南大学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它不属于西方教会的任何一个教派, 它欢迎中国人的合作, 最终目标是交给中国人管理。岭南大学最初的目标是建成一所中国基督教大学。但岭南大学董事会认为, 他们自己对学校的定位是一所非教派学校, 为此还特别发表了一份声明。这份声明说: “由于学院和传教会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因此学院基本上不分教派, 而是寻求在华活动的各教派之间的合作和团结, 共同进行教育和传教, 加强基督教在这个国家的影响。因此, 接受广州基督教学院聘任的每位申请者都必须为促进这所学校的教育和宗教目标而努力。”¹⁾

1885年下半年, 哈巴博士由于健康原因辞去培训学校校长职务, 回到美国。他再次请求批准在中国开办一所基督教大学。这一次得到了美国长老会海外差会同意, 1885年12月7日的会议记录表明了西方教会在中国开办一所基督教大学的目的: “他们认为建立一所与贝鲁特大学计划完全相同的大学对在中国传教事业起着极为重要的辅助作用。”²⁾ 于是, 海外差会授权哈巴牧师博士以教会的名义来进行筹款, 并负责执行这项建校任务的具体事宜。

当时, 这所基督教大学的预期目标是由预科部、本科部和医学部等3部份组成, 在美国设一个托管会, 在中国设一个董事会, 开办的预算经费至少需达到30万美元。按当时的比价, 30万美元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要实现这一目标相当艰难, 哈巴博士此时已是67岁的老人, 在自己薪水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 首先以保证书形式捐资1万美元。大概是这种执著精神感动了他的朋友们, 有一位辛辛那提的亨利·马丁一次捐助了25 000美元, 纽约的斯图尔特夫人出资25 000美元, 捐设了一个教授职位纪念她的丈夫, 还有一位热心在纽约的广东侨民传教的大卫·托伦斯也先后捐了10 000美元, 再加上其他的零散捐款, 到1887年末, 共集资10万美元, 作为筹建费用已经够用了。1887年11月, 托管会任命哈巴博士为校长, 授权他来中国租房办校, 而哈巴博士一直认为广州不是校址的最佳选择, 因为他本希望一所中国基督教大学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传教的功能。然而, 长老会广州布道团委派香便文牧师向海外差会请求批准在广州建校时, 哈巴为了协调行动, 勉强同意了这一主张, 但海外差会后来仍没有同意这一要求, 此时, 除了上海、中国北方某地等选择之外, 甚至还有了在当时属于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九龙建校的动议。

直到在中国的董事会成员一起投票时, 才最后决定这所计划中的基督教大学的校址定在中国南方城市——广州。形成这个决定有许多客观原因, 譬

如香便文先生说的: “以广州为代表的区域, 其人口之众相当于法国, 面积还大于法国。这一地区为自然屏障所分割, 说的语言也迥异于中国的其他地区。在整个华南的辽阔大地上, 人口已达3 000万到4 000万, 却仍未有一座学府为当地人民提供高等教育。对此, 所有有关人士越来越引以为憾。”³⁾ 因此, 在广州的传教士和有可能表达意愿的广州士绅及官员共同促进了这一结果。另外, 有的传教士还跳出传教布道的局限, 从文化角度分析认为, 如果这所基督教大学学校想在引导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方面起到作用, 就必须植根于中国的社会环境中。在传教士被允许定居中国之前, 1818年在马六甲建立的英华书院, 在影响中国教育方面是一个令人失望的例子。一个女传教士很精辟地概括了这一形势, 她说: “要是去九龙, 就等于把发酵粉放在了面包的外面。”于是托管会向纽约州立大学董事会申请注册。经短期磋商后, 就收到了同意的答复。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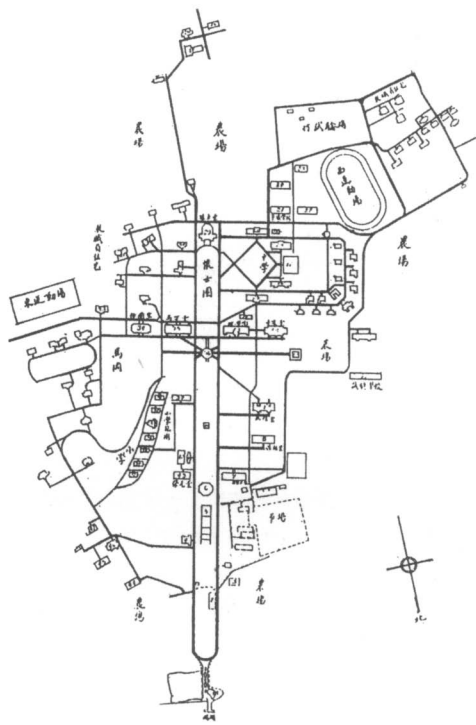
2. 校园规划

1902年10月18日, 岭南大学付出第一笔钱买来了广州的珠江南部的一块地皮。可是由于这块地是由许多小块地组成的, 地权所属关系复杂, 过了一年半才最终把土地买到手。1904年春, 岭南大学拥有了将近200亩土地, 校长尹士嘉对此作如下描述: “地点很好, 气势不凡, 来往便利, 有进一步建房的良好基础, 地势较高, 夏季必得微风之利。”⁵⁾ 当时, 新校址远离广州市区东部约4km左右, 周边的水道也比现在宽阔的多, 学校与广州市区的交通只得依靠一只3人划的小船, 每日往返两次来维系, 后来才被汽船所代。尽管新校址没有便利的交通条件, 但正好符合了传教士理想中的大学模式, 即大学应是位于城市郊外的僻静学术区, 就像他们所习惯的欧美大学那样。

1904年春天, 晏文士对新校址进行了初步勘察, 并绘制了地图。学校董事会派一位名叫司徒敦 (EDMUNS, JR. H. A) 的美国青年建筑师来到广州。司徒敦重新勘察了校园, 画出了待建房屋位置的平面图, (图1) 尽量在学校拥有的狭小土地上安排所有的建筑物。最初的校园规划是相当困难的, “因为这片土地包括许多不规则的小块地, 周边有450个拐角处。当时并无人认识到20年后校园会有此时的20倍之大。”⁶⁾ 实际上, 当时的岭南大学还算不上真正意义的大学, 开始时还是以小学和中学为主, 甚至还没有开设大学部。司徒敦的规划是将小学、中学、大学都混杂在一起, 组合成一个整体校园, 将可以预见的建筑沿着一条南北轴线依次排列, 其功能分区则是将小学、中学、大学划分

为南北三个部分, 从总图分析来看, 在中国教会大学的校园建设中, 岭南大学的规划可算得上特殊的案例了, 完全是按城市结构的概念来进行空间布局的, 由南至北的主轴线是开敞的草坪和校园的主要道路, 主轴线两侧的建筑一律以山墙面临路, 没有围合院落, 没有主次之分, 没有标志建筑, 轴线上的亭子和北端的小体量的格兰堂相对于尺度宽阔的纵向空间来说, 只是一种西方规划中常用的点缀建筑小品。至于何故出现这种与其他教会大学校园风格迥异的规划手法, 估计是与岭南大学的办学特点有关。由于岭南大学不属于西方教会的任何一个教派, 决定了其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内外的捐赠, 岭南大学欢迎中国人的合作, 决定了其宗教色彩不能过于明显, 突出了某一位捐款人或某一位外国人都是不合适的, 因此, 实行了一种比较均等的校园规划方式是符合岭南大学实际情况的, 根据捐款人的捐赠来安排体量相差不大的建筑物, 每幢建筑物构成一个教学单位, 每一个教学单位均有相对独立的教学设施和图书资料, 但都在大学行政机构的管理之下。

这种规划布局方式影响了岭南大学的整体环境和整个建设过程。按照规划要求, 岭南大学的总体建筑风格必须统一和谐, 但每幢建筑物可自行决定具体的建筑式样。由于获得捐赠的时间和机会无法掌握, 每幢建筑物均是独自进行建设的, 建造年代也不相同, 所以,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和具有不同设



1 岭南大学时期的早期规划图 (来源: 私立岭南大学一瞥)

计经历的一批建筑师,均可按照各自对总体建筑风格的理解决方式,运用多样化的设计手法提出设计方案,从而避免了单调重复之嫌,形成了岭南大学的建筑特色。

因校园面积和办学层次等条件的限制,司徒敦的规划显然不能以一所完整的大学校园的标准来加以评判,但这个规划为岭南大学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尤其是这个规划的范围不但成了后来的校园中心区,而且还基本保持了原来的规划构思。在岭南大学逐渐产生一些社会影响后,学校的领导人就一直在寻找各种机会进行扩大校园面积的努力,譬如,在20世纪30年代时,钟荣光校长抓住政府欲加强农业建设的时机,以学校需要更多土地进行农业科学实验为由,及时劝说省长征收校园周围的地产,一次就成功地得到了900多亩土地。⁷⁾

经过多次努力之后,到抗日战争前夕,校园面积已比早期规划时扩大了20倍左右,而且,岭南大学也演进了名副其实的大学了,其校园终于按照大学的规模 and 标准来调整完成了空间布局,教学区、生活区、运动区的结构功能已基本清晰,还是沿用早期规划的设计手法。(图2)

1、保持早期规划的中轴线,南北向贯通直达珠江边上,由具有纪念意义的格兰堂和各具特色的中心绿地广场,在轴线上形成纵向系列的开放空间。

2、将早期规划的范围作为校园的中心区,集中安排教学功能教师生活区移至校园的西南区和东南区,并附设中小学,此时,岭南大学已放弃对社会开放的中小学教育,仅仅是作为教职员服务的生活设施了。

3、在东北区设置学生宿舍,体育设施得到了充分的考虑,校园内还有良好的足球和网球设施。

4、重视建筑与绿化或广场相结合,建筑风格统一且富有变化。

5、规划调整时曾考虑安排一条东西向的轴线,在已存在的线相交处共同构成校园的中心景观点,试图解决没有校园的主要景观节点的缺憾,但后来没有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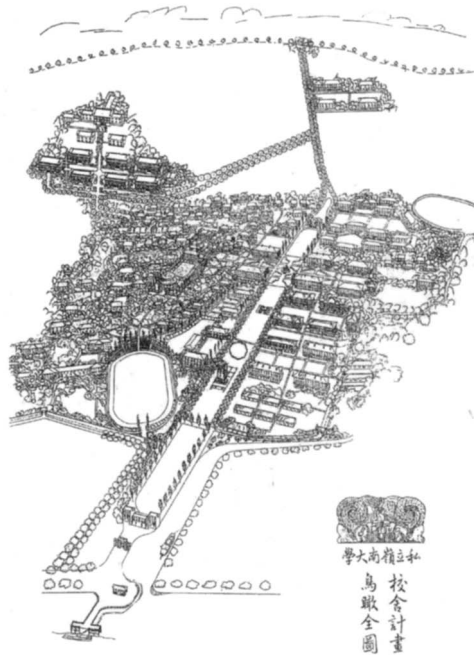
总的看来,岭南大学的规划是相当成功的,西式的规划布局的空间结构和中式建筑风格的有机结合,成为教会大学校园建设中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实例。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校园的绿化景观显示了岭南地区的气候条件的优势。当第一批建筑物按照司徒敦的规划完成之后,校园看上去光秃秃的。1908年岭南大学请来了宾夕法尼亚州立学院的高鲁甫园艺师,开始了系统的植树活动。不久,校园里就种植上了李树、榕树、樟树和荔枝树,创造了一种优美

的校园环境。重视绿化的空间布局是教会大学规划中常用的手法,如果用现代建筑的外部空间设计理论来解释分析,或许可以有许多说法,但就教会大学而言,其主要目地是想利用半封闭的绿化空间提供一个可供交谊的露天场所,以增进学生之间和师生之间的感情联系,这样便有可能保持教会大学的持久影响力。这种良苦用心是教会大学规划中的主要指导思想,因此,教会大学的校园建设普遍追求园林化,从岭南大学的规划中可看到几何图案的广场花园,精心布置的草坪绿地,道路中心的花坛等等,尺度适宜,层次分明。在校园规划的生活区设计中,着眼于加强师生之间的日常接触,以大面积草坪,广植树木,湖泊水面来创造一个使学生留恋的优美环境,以维系学生对母校的美好回忆和深厚感情,普遍重视校园的早期规划,是当时教会大学校园建设最突出的特点之一。

从岭南大学的早期规划中,我们可以寻找出传教士追求的大学模式,即大学社区的概念。传教士希望有充足的土地来修建教学楼、实验室、办公楼、教师住宅和学生宿舍、运动场、教堂及其他附属建筑,使所有师生都能容纳在这个充满基督教气氛的学术区内,形成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倾向于将大学建在僻静的城市郊区,与外面的社会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既避免学生受到市区商业和娱乐的干扰,又能发挥教会大学对社会的影响作用。这是与中国传统书院截然不同的规划概念。中国传统书院要么建在远离城市的山林之中,求个脱俗超凡的雅士形象,要么建闹市中心图个方便,似乎后者更为常见。20世纪初的国立大学,一般也建在市区,且不太注意校园环境,“常常沿用旧有建筑如清代书院,科举贡院,贵族府第,官衙门作为校园”,⁸⁾校园面积普遍较小。即使在当代中国大学中也可看到这一概念差别所导致的结果;20世纪初期,中国各省都建立了国立大学和公立专科学校,但如今仍在原校址发展的不多,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所院校,而教会大学的校园大多数已成为著名大学的校址,尽管校名已经改变。

但从另一角度来讲,教会大学重视校园整体建设,追求一种与世俗脱离的环境气氛,也使得中国社会对其认同感降低,给教会大学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为中国教育没有学术区这一概念,因此这一概念及其他有关细节的输入,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造成了一种印象,以为传教士教育工作者正在中国建立国中之国。”⁹⁾这一印象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教会大学与中国社会的脱离,在以后的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主权的过程中,这也是教会大学遭到激烈反对的主要理由之一,实际上遏止了教会大学校园建设的继续进行,岭南大学也是如



2



5

此。

3. 校园建筑

岭南大学的第一批建筑有马丁堂及一些附属建筑，1904年9月，由美国纽约的斯托顿事务所完成了第一幢建筑的方案设计。该方案于1905年11月完成了施工图设计，并采用了美国的专利技术，将结构方式改成了砖石钢筋混凝土，工程负责人为柯林斯(A. S. Collins)。起先，这幢楼房被称作“东院”，后改作“马丁堂”，以纪念辛辛那提的亨利·马丁，因为马丁先生捐赠了岭南大学的第一笔也是当时最大的一笔建校经费，马丁堂的造价约为25 000美元，正好是这笔捐款的数目。

马丁堂的建筑面积约2335m²。长50.68m、宽16.14m、高15.80m。立面分为地上3层和地下半层。其平面为地道的“殖民地式”，即在主要使用房间的周边以柱廊形式将其围合。因使用材料的关系，它的承重结构可以不依靠拱券而完成，故此马丁堂就未带有这种建筑所常用的“券廊式”立面。其底层柱廊仍使用了平缓的砖拱起装饰作用，而2层和3层则并未发拱券。建筑的线角及装饰尚保留一些“殖民地式”的作法。¹⁰⁾ 马丁堂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有特殊的地位。这幢楼房是第一幢由机制红砖而不是用通常的灰色软质砖建起来的房屋，而且更重要的是：马丁堂不但是“中国第一幢钢筋混凝土混合结构建筑，”¹¹⁾ 还是第一次采用了混凝土地面的建筑。从建筑形式构图来看，“马丁堂”采用的中式屋顶和西式墙身的组合方式，确定了岭南大学建筑风格的基调。马丁堂的屋顶形式为一般民居的四坡顶，没有官式建筑的屋面反宇曲线，檐口也平直，这样显然更符合钢筋混凝土的材料性能和技术工艺。屋面不但省掉了中国传统建筑的装饰性部件，而且还突出地排列着西方式烟囱，正中耸起一个非中非西式的小亭子作构图中心。可以说，“马丁堂”反映了近代早期的西方建筑师在对中国传统古典建筑的诠释和了解方面，还是有着某种审美偏爱(图3)。在马丁堂的建造过程中还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情，1905年，当地对立的村落之间在校园内为家族仇恨开战时，只建了一部份的马丁堂作为其中一方的堡垒，当子弹在校园内穿梭，学生们都很兴奋，似乎自己也与世俗社会有了一点沟通。1907年竣工时，马丁堂成了在珠江南岸地区最引人注目瞩目的建筑。孙中山于1912年5月3日访问了校园，还在马丁堂发表了演说，(图4)葛理佩是这样记载孙先生访问的：“全校所有学生，约300来名，穿著整齐的校服，从小河到校舍站成了密密的一排。马丁堂容纳不下那么多的学生，他们就坐在走廊的地上。孙先生和学生们谈得很好。他告诉他

们，他作学生时和他们现在是多么不一样。他们可以安心地学习，以后也可望用到所学的知识，而他以前却不能。他作为一名雄心勃勃的学生，曾被迫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实现因为有一个坏政府而无法实现的理想。我们照了一张全校师生和孙中山及其他人的合影。”¹²⁾

实际上，岭南大学的建设周期并不长，从柯林斯设计的马丁堂到墨菲设计的哲生堂，持续时间不过三十多年而已，对于一所大学的发展过程而言也确实太短了。但是，在中国近代史中，这三十多年是一段难得的相对平静时期，岭南大学的主要建筑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并成为现在的中山大学悠久历史传统的表象参照物。

从1909年到1928年期间，岭南大学的主要建筑均由PHILIP. N. YOVIK、JAS. R. EDMUNDS, JR. R. A等设计。¹³⁾ 代表性的建筑有：1915年设计的格兰堂、1915年设计的怀士堂、1919年设计的马应彪招待室、1924年设计的荣光堂、1928年设计的理科馆等。这类建筑大部分设有半地下室，钢筋混凝土结构，平面上分为规整及不规整的，形式上则是融中外建筑形式为一体，并结合了岭南地区的气候条件和民居特色。1928年之后，由墨菲事务所(HENRY KILLAM MURPHY)主持设计的哲生堂、陆佑堂、惺亭等建筑，则带有更多的中国传统的官式建筑形态，从整体比例到细部装饰都表现了皇家宫殿建筑的味道。

据有关的回忆录记载，岭南大学董事会的一位理事、宾州大学建筑学梁华伦教授在所有有关建设的决定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¹⁴⁾

按其时间顺序和建筑形式，岭南大学的建筑大致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3.1. 早期阶段

在岭南大学的早期阶段，真正按教学用房设计的建筑并不多，上述的马丁堂是最早的教学楼，采用当时常用的券廊式布局，沿着建筑的长边一侧设外廊，平面简单实用，于前述的中学课室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体量更大一些。实际上，马丁堂最初确实是用于中学教育的，因为，马丁堂落成之时，岭南大学还没有独立的大学部。

当时，中学部确有了一定规模，除了教学楼之外，第一幢新宿舍的建造也于1909年8月开工，也是用砖头 and 水泥建成，1910年3月1日完工，造价39 000元。此外，美国人为学院兴建寓所的捐款明显增加了，校董事会的主席积臣为建造校长住所捐了5万美元。在他去世后，董事会决定把这所建筑命名为“积臣屋”。芝加哥的塞路斯·麻金墨夫人已捐款修建了一处住所，又为中学副校长修建了一所。芝加哥的伊沙贝·布勒斯顿(黑石)夫人捐款

2 岭南大学在民国时期的校舍规划鸟瞰图/来源：私立岭南大学一览

3 马丁堂全景的早期照片/来源：广州旧影

4 孙中山在马丁堂前与师生合影/来源：岭南大学

5 岭南大学黑石屋/来源：岭南大学

为钟荣光校长盖了一幢寓所，后来这幢寓所被称为“黑石屋”。（图5）艾克曼·高士博士出钱修建了一所房子，以“高士屋”命名，给了学校的林安德医生使用。有位海伦·哥德小姐捐赠了遗产来修建了一幢“哥德屋”。此时，小学部的主楼建设也在筹备之中。

1911年辛亥革命后，岭南大学又开始积极地建造房屋，并在校园里新增添了最重要的两幢建筑物。1912年，董事会授权兴建行政楼，纽约的约翰·肯尼迪夫人捐资25 000美元，应肯尼迪夫人要求给行政楼取名为“格兰堂”（图6），以“永久地铭记为学院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因为这位先生在募集建校资金方面做出了特殊的贡献。1913年，安布雷·史怀士答应出资25 000美元兴建一座基督教青年会所楼。史怀士是克里夫兰州的华纳和史怀士公司的总裁。他的公司不仅生产机床，而且还为世界上几个最大的望远镜制作了底座。

从高士屋的测绘图分析（图7），可将岭南大学早期建筑特征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点：

（1）建筑形态采用了折衷主义手法，以西方建筑的构图方式为主，西方风格明显多于中国风格。

（2）屋顶形式不尽相同，一般的做法是铺青灰色普通瓦片，尚未出现宫殿式的琉璃筒瓦，因此具有岭南民间建筑的韵味。

（3）平面多为规整的简单矩形，即使有变化也是左右对称。

（4）除玻璃、铁制配件等外，基本建筑土木用料均取自本地。

（5）大量应用西式建筑的造型元素，或圆拱，或窗洞、或券柱式外廊，或入口装饰，是外部构图的主要手段之一。

（6）墙面均为砖石本色，不加粉刷修饰，以青灰色或红色为主。

（7）结构体系一般采用砖石承重和钢木屋架，建筑体量不超过三层楼。

（8）建筑装饰均以简化处理，外部造型不加色彩效果。

（9）校园主体建筑多用西式钟楼做构图中心。中国式亭子的造型和入口抱厦处理方式似乎被西方建筑师所偏爱。

（10）整体形态以朴素简洁为主，重视施工质量，对建筑功能的要求不太高。

3.2 过渡阶段

1916年，岭南大学才下决心着手进行大学部建设。校长晏文士说：“学校已有了一个初具规模的中学部，我们现在筹建一个规模适当的大学部是极困难的，因为与中学部相比会让它相形见绌。”¹⁵⁾

1919年，岭南大学的钟荣光先生赴印尼爪哇各地，向华侨募捐建造大学部的第一幢楼房。在那儿，他进行为期5周的游说活动，共筹集到了7万港元。该建筑于1920年动工，为四层建筑。1920年建成，为纪念爪哇华侨的资助，故取名为“爪哇堂”，成为男大学生的宿舍楼。（图8）

印尼华侨张弼士（1841—1916）当年积极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热心捐资办学。他在晚年立下遗嘱，要捐助岭南大学。他死后，其后裔于1921年捐建一所华侨学校，取名为“张弼士堂”。（图9）

1918年，一些对丝绸感兴趣的法国人和美国丝绸商人来到岭南大学，要与岭南大学合作研究提高华南蚕丝的质量。到后来，蚕桑学成为岭南大学农学院的一个很重要的专业方向。在随后的几年内，岭南大学为此项目建起3座大楼。第一幢楼是由美国丝绸协会捐赠的，里面除了有办公室和实验室外，还有养蚕房。第二幢楼是美国纽约丝绸进口总公司的马科斯·费德勒捐赠的，主要作为短期培训班的学生和学徒们的宿舍。第三幢楼是亚特伍德抽丝实验工厂，由尤金·亚特伍德和爱德华·布拉德里捐赠。这座实验工厂是一个实验缫丝场，里面还专门设计了一个冷库，这幢楼可能是岭南大学实验室建设的开端。（图10）

随着中国国立大学的兴起，教会大学的办学优势逐渐丧失了，也没有能力与国立大学来抗衡。有的教会大学开始致力于某些专业领域，试图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于是，岭南大学对发展农业非常感兴趣，并希望在这个专业领域内保持领先地位，甚至还制定了一项计划，打算将农学系发展成岭南农科大学。1921年10月，校董事会原则上批准了这个计划，在1923—1924年为此计划筹集了相当于43 000美元的资金，用于建设了一座农学院楼。

1928年是岭南大学建校二十五周年，也是岭南大学建设中最有收获的一年，农学院楼终于落成了，命名为“十友堂”。（图11）同时，史达理夫人为纪念她的丈夫而捐赠的一幢实验楼也竣工了，因为史达理（The Willard Straight）是岭南大学基金理事会的成员，这幢楼被命名为“史达理科学纪念大楼”，此为岭南大学开办以来的第一座真正的理科实验室。（图12）

此外，由学生共同捐建的“荣光堂”，广州先施公司总裁马应彪先生出资建造了捐资建造的大学护养院和迎宾楼（又名马应彪招待所）也在这一阶段完成。这位马应彪先生在广州的近代城市建设中做出了很大贡献，当 he 被选为岭南大学董事会的第一位中国董事之后，为校园建设捐赠了不少资金，但他并不是一个基督教徒，也没有什么宗教情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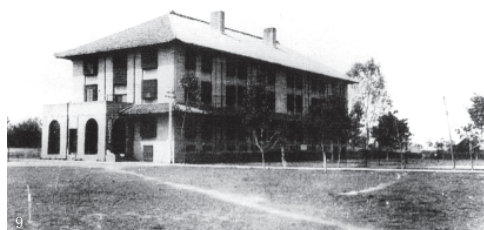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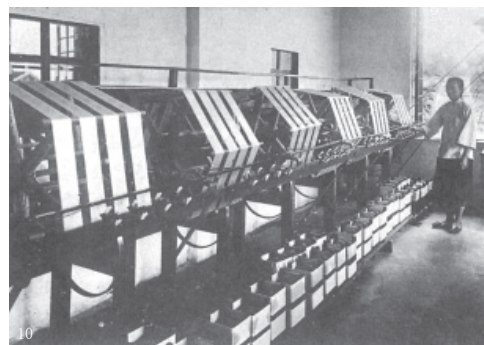
7



8



9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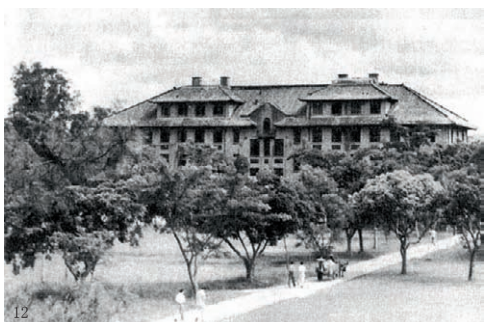
6 岭南大学格兰堂来源/岭南大学

7 岭南大学高士屋立面图/来源：汤国华提供

8 岭南大学爪哇堂/来源：岭南大学

9 岭南大学张弼士堂/来源：岭南大学

10 岭南大学蚕丝学院的纺丝车间/来源：岭南大学



13



14



11 岭南大学十友堂/来源: 岭南大学

12 岭南大学史达理科学纪念大楼/来源: 岭南大学

13 岭南大学哲生堂立面图/来源: 汤国华提供

14 岭南大学陆佑堂侧面/来源: 中国近代装饰与城市

15 岭南大学广寒宫/来源: 岭南大学

这也可以视为岭南大学世俗化的一个例证。

纵观这一阶段的建筑情况,可以发现岭南大学的建筑风格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1) 教学及实验用房明显增加,平面多采用中间走廊形式,已很少有早期的那种券廊式布局,表明了此时的设计仍是以实用和经济的观念为主。

(2) 已有部分建筑出现了屋面反宇曲线,檐角也有不太明显的起翘。已经相当重视屋顶的造型功能,多采用双重屋檐,但似乎还没有寻找出较好的处理手法,整体组合显得比较勉强。

(3) 墙面不增添装饰构件和色彩,仅仅按需要开简单的矩形窗洞而已,且基本保证对称和均匀的布置。

(4) 建筑形态仍然采用了折衷主义手法,墙身以西方建筑的构图方式为主,屋顶则已改变为明显的中国风格,地方特色非常突出。

3.3 同化阶段

1928年之后,墨菲设计的中西合璧式建筑造型得到巨大的成功,逐渐得到社会认同,他的中式大屋顶建筑造型风靡当时中国的公共建筑类型和文教建筑类型,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和中国建筑师的积极实践中,墨菲式的中西合璧式建筑造型演进成了一种程式化的处理手法,即一律采用琉璃瓦屋面、朱红色的圆柱、蓝绿色的斗拱及梁枋彩画,灰白色的外墙装修,再配合一个惟妙惟肖的中国宫殿式造型的大屋顶,其尺度与规格也基本对应中国古典建筑型制。这也从另一侧面表明,当时采用先进的建筑设备和工程技术,也是中西合璧式建筑造型得以社会认同的基本条件,没有相对合理的内部功能和使用设备的保证,其外部造型的某种内涵意义也是难以展示的。

在这一社会时尚的影响之下,岭南大学乃至整个广州市的建设都出现复古主义趋向,典型实例有哲生堂、陆佑堂(图13、14)以及纪念殉国师生的惺亭以及风雨亭、八角亭、女生宿舍的广寒宫(图15)等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30年建成的工学院,“全部图纸由黄玉瑜工程师绘就,”^[16]这也是中国建筑师的设计首次出现在岭南大学校园里。这类复古主义作品在整体上把握了中国古典建筑的比例尺度,造型基本准确,细部也合乎规范,加之施工考究,装修华丽,都不失为岭南大学建筑中的精品。

4. 历史评价

在广州文物志中是这样评述岭南大学的建筑群:

“在民国初年的广东高等教育中,岭南大学在规模、师资、设备、教学等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

孙中山曾3次到岭南大学参观,发表演说并捐款,期望岭南大学学生担负建设民国的责任。1927年,岭南大学率先收回由中国人管理。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时,岭南大学文理科合并到中山大学,改作中山大学校址。

岭南大学旧址现存中心区包括由南校门到北校门中轴线一带的建筑,以及东侧的马岗顶洋教授宿舍,东南侧的广寒宫和西侧的模范村中国教授宿舍。中轴线一带的建筑有怀士堂、黑石屋、第一麻金墨屋(陈寅恪故居)、第二麻金墨屋、马丁堂。格兰堂、积臣屋、天主堂、东正教堂、岭南附小建筑群(含陈嘉庚堂)、荣光堂、马应彪招待所、哲生堂、陆佑堂、爪哇堂、十友堂、化学系楼、岭南附中建筑群、张弼士堂、马应彪夫人护养院等。现存的原岭南大学建筑群,建筑风格中西合璧,既有校园建筑格调的统一性,又有设计手法的丰富性,是本世纪初南方大学校园建筑的典型实例。”^[17]

这也是对近代岭南教会学校建筑的客观公正的评价。

注释

- [1] 李瑞明编. 岭南大学. 岭南(大学)筹募发展委员会, 1997: 47.
- [2] 同上注: 7.
- [3] 同上注: 7.
- [4] 同上注: 18-19.
- [5] 同上注: 27.
- [6] 同上注: 31.
- [7] 岭南大学香港同学会印行. 钟荣光传, 1996: 52.
- [8] 徐卫国著. 中国近代大学校园建设. 新建筑, 1986 (4).
- [9] (美)杰西·格·卢茨著, 曾钜生译. 中国教会大学史.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65.
- [10] 广州文化局等编. 广州文物志. 广州出版社, 2000: 128.
- [11] 谢少明著. 岭南大学马丁堂研究. 载华中建筑, 1988 (3).
- [12] 同注[1]. 40.
- [13] 杨永生, 顾孟潮主编. 20世纪中国建筑. 刘业著. 岭南大学.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 124.
- [14] 同注[1]: 48.
- [15] 同上注: 48.
- [16] 同注[7]: 98.
- [17] 广州文化局等编. 广州文物志. 广州出版社, 2000: 154.